

前言

我在內地長大，大學畢業之後來到澳門工作。因著美麗的緣分，成為澳門文學界的一分子，和文友們酬唱應和、攜手並進，共同為澳門文學的苗圃淋水澆花，見證澳門文學一步一步拓展版圖、亮相世界舞台。不過，在來澳之前，我並不確切地知曉文學為何物、其魅力何在，更是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竟會和星空般遙遠的“文學”發生這樣“親密”的“接觸”。在我少年的時空裡，不是跳躍的旋轉電子，就是幾何的流線圖形。我的精神領地，是不完整的。

如果說，文學是深埋在我心中的一粒種子，澳門則用她慷慨溫暖的懷抱，包容它、滋養它、耐心地等待它，直到有一天——或許是某個盛夏的午後，或許是某個潮濕的夜，忽然觸動了種子生命的機關，喚醒了我沉睡的文學靈魂——我的第一篇文學作品，是在澳門醞釀、寫作並發表的。是澳門催開了我的“文學之花”。我開始寫作，也認識了越來越多的文友——澳門，勢不可擋地成為了我的精神故鄉。她似母親般沉默而溫柔，深廣而有力，我依戀她，我沒有任何理由不關注她、不研究她。在得知許多史料因種種可抗或不可抗的原因流失、許多記憶因當事人離去而永遠塵封時，一種前所未有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噴湧而出，聚在心頭，難以散去。

澳門無疑是一塊文化寶地。

首先，澳門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澳門地處東南沿海的珠

江西口岸，原屬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與今天的珠海市灣仔鎮一衣帶水，文化上與粵港兩地一脈相承，都是具有嶺南特色的粵文化。不論從歷史沿革、地理區域、社會經濟方面看，還是從宗族種姓、文化心理、民情風俗等方面看，澳門均與珠三角各地基本相同，體現出粵澳本為一體的歷史狀貌。自葡萄牙人據居澳門，為其注入了來自歐洲等地複雜多樣的血脈之後，這片土地便日益豐饒起來，以一種弱小卻倔強的姿態成長於中國的邊陲，成為了不同民族、種族和文明的匯集地。

其次，澳門是一個形態獨特的文化空間。澳門所遭遇的歷史命運與所包含的文化意蘊，使她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更是一個積澱著多重指涉的文化名詞。澳門於 1557 年開埠後，成為中西文化、宗教長期交匯之地和東西方“互看”的一個窗口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在漫長的歷史當中，逐漸形成了“博物館式”的都市風貌，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因此，從澳門看中西方文明之間的碰撞和交融，探討跨文化性質的內涵，是一個要用多元視角對其投射並不斷進行研究的課題。正因為澳門有如此豐饒的歷史文化，所以在研究澳門文學時，就不應只是關注文學自身，更重要的是聯結它背後所蘊含的歷史和文化。

最後，“小”澳門有“大”容量。作為一個形態獨特的文化空間，澳門在平面地理學意義上是很小的。在歷史上，澳門曾有過相當於鄉鎮一級的建制，有香山澳、濠鏡、濠鏡澳、濠江等古稱。1999 年回歸時，澳門是一個只有 43.5 萬人口，23.8 平方公里土地的半島；今天，澳門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擁有約 69 萬人口、33.3 平方公里土地的國際化都市。但澳門永遠跟“大”是不沾邊的，香港

人管澳門叫“澳門街”，澳門人自己則有“土澳村”的揶揄叫法。林中英在發表於1998年總第13期《澳門筆匯》的〈小澳門 大澳門〉一文中也說：“澳門社會的微型格局，特別在身旁那個大香港的陰影之下，澳門人的確普遍大氣不起來。”確實，在頗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澳門跟在香港後面亦步亦趨，唯香港“大哥”馬首是瞻；然而，澳門回歸以來，多年的“小弟”已在不知不覺間超車“大哥”。以經濟為例，回歸前的澳門經濟總產值不足一百億澳門元，到2015年已達三千六百多億元，增長三十多倍，人均產值亦水漲船高，於2007年超過香港，2014年超過瑞士，位居全球第四位。這幾年大環境不太景氣，經濟有所下滑，特別2020年全球爆發新冠疫情以來，經濟更是受到巨大衝擊，但人均經濟產值仍然超過香港。昔日的梳打埠，已是世界最富有的地區之一。2017年1月18日，港媒《東方日報》的“雪泥鴻爪”專欄〈小香港與大澳門〉寫道：“論人口，澳門不及香港十分之一；論面積，澳門僅約香港三十分之一；論回歸，澳門比香港遲兩年，但各方面條件都不如香港的澳門近年脫胎換骨，在很多方面後來居上，大香港及小澳門已有倒轉之勢。”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小”、“大”之間，並無絕對；澳門的“小”，僅僅是從地域上說，它的內容量卻絕不止於此，就像饒芃子在《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一書中指出的：“一個地區的文化學術意義和價值並不決定於該地區的大小，而在於她的內涵，她所蘊涵的文化學術命題的價值和意義。”¹ 澳

1 饒芃子：《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1頁。

門有四百多年的中外交流歷史，“小”澳門非但不小，反而更像是一部塵封了四百年的“大”書，靜待後人翻閱。澳門之獨特地理、“小”、“大”合一及豐厚歷史，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所難以取代、也無法比擬的。因此，澳門回歸前，報告文學作家陳祖芬在富豪酒店門前朗聲一句“澳門是越看越大”，是很有見地的。

在這樣一個邊陲之地萌芽壯大起來的澳門文學，無疑具有強烈的獨特性：在中華文化圈裡，澳門既是與西方文化現代性最早相遇的區域之一，又是最晚擺脫西方政治權力直接宰製的“特區”。這種政治格局約束使 20 世紀的澳門漢語文學徘徊在中國文化 / 文學的邊緣，成為見證中國文學現代性所尋求的他者鏡像。

然而，澳門文學卻又不是一個無關的、遺世獨立的“他者”，它是中國文學現代性進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中國新文學的認知鏡像。朱壽桐在〈從澳門說起〉一文中指出：“中國的近代，中國文學的近代化，中國被動地向西方開放的近代性，應該從澳門說起。”¹ 重新定位澳門以及澳門文學，在澳門文學研究中參考並使用澳門史研究的已有成果，構築新的文學史敘事，使本研究具有重寫中國近代文學史、思想史和學術史的潛在價值。

在漫長的 20 世紀，澳門文學發展的進程是緩慢的。1920 年 1 月，馮秋雪所作之白話新詩〈紙鳶〉標志著澳門文學史上第一首新詩誕生。從 1930 年代開始，由時局劇烈變動而催生的“抗戰文學”強力植入，步履蹣跚的澳門文學被直接納入中國新文學的賽道。然

1 朱壽桐〈從澳門說起〉，澳門日報，2011-12-7（F5）。

而，華文純文學期刊和專業作家群體的同時缺席，使真正由本地萌發的澳門文學看起來似乎仍然處在“冬眠”狀態。直到 1980 年代，本地詩人韓牧¹提出“建構澳門文學形象”的議題，“澳門文學”才在之後的 1991 年，於廣東中山市舉行的第五屆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被正式納入“華文文學”範疇。

澳門新文學的真正蘇醒，得益於現代報紙媒介的發展。“九一八事變”強烈地震顫了中華民族的神經，各界愛國人士紛紛走上街頭組織救亡運動。誕生在這烽火漫天危急時刻的澳門中文報紙，自出生便肩負起抗日救國的重任。從抗戰時期的《朝陽日報》、《大眾報》、《華僑報》到新中國成立後創辦的《新園地》，澳門的中文平面媒體行業在老一輩報人和愛國志士的竭力維持經營下艱難地成長起來。及至 2025 年，澳門共有報社 38 家、報紙 38 種，其中外文報紙 7 種、中文報紙 31 種。中文日報或準日報 13

1 韓牧（1938-），原名何思揚，另有筆名鄭展怡、向巽玲、衛紫湖等，生於澳門，1957 年隨家人移居香港。1960 年代以來在港澳兩地發表大量詩作，早年以〈馮至詩分期研究〉為題完成澳門東亞大學（現澳門大學）碩士課程，與澳門中國語文學會合作組織“每月詩會”（又稱“澳門新詩月會”）。1989 年冬移居加拿大，現任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理事，國際詩人協會會員。著有新詩集《鉛印的詩稿》、《急水門》、《分流角》、《伶仃洋》、《待放的古蓮花——韓牧澳門詩選》、《新土與前塵》、《回魂夜》、《韓牧詩選》、《島上詩：島上與海外》、《海外詩：島上與海外》、《韓牧社會詩》、《梅嫁給楓》、《愛情元素》，新詩合集《裁風剪雨》，散文集《韓牧散文選》、《牧人看世界》、《牧人聲聲惜》、《韓牧文集》，評論集《韓牧評論選》、《剪虹集：韓牧藝評小品》。另有《韓牧散文書法新輯》、《何思揚書法集》，《Finn Slough 芬蘭漁村詩影集》、《她鄉，他鄉》詩影集，《草色入簾青》攝影詩詞集等。短詩入選香港中學語文教材，寓言詩獲日本選入“中國語”課本中，詩作〈一朵罌粟花的聯想〉為加拿大國殤紀念日朗誦詩。擅隸書、甲骨文，所書長篇甲骨文〈心經〉、〈正氣歌〉、〈大同篇〉等，為書法史創舉。書作為各大博物館、美術館、文學館、紀念館收藏。

種，包括《澳門日報》、《華僑報》、《市民日報》、《新華澳報》、《濠江日報》、《正報》、《大眾報》、《星報》、《現代澳門日報》、《正思今日澳門》、《力報》、《澳門時報》、《捷報》，其餘為定期或不定期出版之週報或月報。現行報紙中，創辦時間最早的是始於 1933 年的《大眾報》。從創辦時間看，澳門回歸前（1933-1999）創辦的中文報紙有 13 種，澳門回歸後（1999-2020）有 18 種，熱度呈穩定上升之勢。在新媒體和短視頻大行其道的今天，澳門報業所呈現出的蓬勃之勢，蔚為奇觀，令人稱奇。按總人口來計算，大約平均 1.6 萬人就擁有一間報社，其密度之高十分罕見，堪稱世界奇跡。2019 年創辦的《大灣區青年報》、《蓮花時報》及 2020 年創辦的《天空時報》，見證了澳門大眾對辦報及讀報長久持續的熱情——但是這一股熱情在進入 2021 年之後開始消退。據筆者統計，截至 2025 年，已有四種報紙停辦，分別是《澳門觀察報》、《捷點資訊報》、《澳門平台》及《天空時報》。

澳門本土的平面媒體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形成了 1980 年代以後以《澳門日報》、《華僑報》為主體的報業格局。澳門本地重要的中文報紙一般都設有刊載文學作品的副刊，如《澳門日報》的“新園地”、《華僑報》的“華座”等綜合性副刊和《澳門日報》的“小說”、“鏡海”、“語林”及《華僑報》的“華青”等文藝副刊。哪怕《力報》、《澳門觀察報》這樣的小報，亦都設有副刊，刊發一些文學性較強的散文或新詩。例如出紙一張，只有四版的《澳門觀察報》，亦專門拿出一整個版面（第三版）作為副刊，並設有“書路之旅”等專欄（該報創辦於 1995 年 1 月 16 日，初為雙週報，2005 年起逢星期天出版，於 2022 年 6 月 26 日發行最後一期

後停辦，共發行 1138 期）。進入 1980 年代後期以來，雖然有《澳門筆匯》、《湖畔》、《中西詩歌》等純文學期刊定期出版，並且為文學創作、傳播和研究提供了相對完整的空間，但是副刊作為澳門文學最主要的園地這一特徵並未根本改變，所謂“框框文學”仍然是澳門文學最為鮮明的特點。因此，廖子馨在〈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一文中說：“澳門新文學是在報紙副刊的搖籃裡成長的。”¹ 朱壽桐在《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一書中也認為：“澳門副刊文化與澳門文學建設緊密聯繫在一起，文學和文化副刊成為澳門文學的主要揭載園地。”不僅如此，他在書中更進一步點明：“《澳門日報》每天一版的‘新園地’，成為澳門文學主打文體——散文包括隨筆的集散地，澳門文學的創新文體——漢語新詩，是該報副刊的常備內容。……更加重要的是，《澳門日報》的‘新園地’雖然以澳門文學家為骨幹作者，但從來就是想向五湖四海公開欄目的公眾園地。來自各地的華人寫作者都有機會在這塊園地上種植自己所擅長的文學果苗。一些由於各種機緣走出澳門的作家、評論家，如著名詩人陶里，還有區仲桃、穆欣欣等，都繼續在這片園地上澆灌自己的澳門夢想。……《澳門日報》的副刊文學確實反映了澳門文學的基本格局。”²

由此可見，《澳門日報》文學副刊吸引聚集了本澳絕大部分的創作群體，其與澳門文學之間的穩固關係讓以《澳門日報》文學副刊作為研究澳門文學總體風貌的切入點具備科學性和可能性，也讓

1 廖子馨〈澳門文學與報紙副刊〉，《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0 年第一期，第 10-12 頁。

2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第 154-155 頁。

我們能夠以實在的姿態透過文學這扇窗口來把握澳門文化的特殊性和複雜性。

一、研究對象及研究現狀

（一）研究對象及其價值

1. 澳門文學

廣義的澳門文學濫觴於明代中葉，可以從明嘉靖三十四年（1557年）葡萄牙人來澳佔居算起。本文所論之“澳門文學”，專指有別於以舊體詩詞文章為主體之舊文學的漢語新文學。二十世紀以來，兩岸四地的新文化和新文學沿著同源而殊途的發展路徑，邁著各自的步伐，遵循著自己的規律和節奏前進。作為一片“化外之地”，澳門新文學的發展表現出明顯區別於其他三地的節奏和個性特色。

當內地舉起新文化運動的大旗、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浪潮且一浪緊接著一浪地衝擊中國社會的舊文化、舊傳統和舊秩序時，澳門仍似一潭靜水，並未因為巨大震盪而泛起太大的漣漪。這一番歲月靜好的景象，在經歷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沉默醞釀之後，終於在1980年代發生了改變。經濟的起飛，大量新移民的湧入，教育水準的提升，歷史文化的長期積澱，特別是澳門回歸所帶來的家國情懷的迸發、本土認同的增強和文化身份意識的蘇醒，在如此眾多因素的聚合推衍下，澳門文學界迎來了春天，迎來了自己的“新文學運動”。1983年6月30日，澳門歷史上第一份純文藝副刊——《澳

門日報·鏡海》週刊的創辦¹，標誌著澳門文學的覺醒。隨著本土作家群體的逐漸成長、文學創作的日益興旺、文學活動的日漸增多和對外交流的日益頻繁，澳門文學的自我形象開始清晰起來。

澳門文學作為概念的確切提出，則在之後的 1984 年 3 月 29 日，詩人韓牧在澳門日報社主辦的“港澳作家座談會”上，發表了一篇標誌性的講話稿。此前，澳門文學一詞雖早已在文藝界獲得廣泛應用，但真正闡明作為學術概念的“澳門文學”以及作為子概念的“澳門文學形象”的，當屬韓牧。這一篇發言，後來以“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為題發表於同年 4 月 12 日《澳門日報》的“鏡海”版²。此後又過了七年，直到 1991 年，作為學術概念的“澳門文學”才在廣東中山市舉行的第五屆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被正式納入“華文文學”範疇。

要想進一步深入到“澳門文學”概念的內涵層面，就要把它放置到更為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去觀照。朱壽桐在〈澳門學視域中的澳門文學〉一文中提出：“澳門文學概念必須與澳門學聯繫起來理解。”、“澳門文學須在漢語新文學的廣闊視閫中奠定澳門學的學理基礎。”³將澳門文學放置於漢語新文學和澳門學的總體格局與理論框架中進行審視，是很有見地的，也為我們進一步深刻把握澳

1 1983 年 6 月，著名散文家秦牧訪問澳門。在他和澳門東亞大學雲惟利博士、《澳門日報》總編輯李成俊及副總編輯李鵬翥的共同推動下，《澳門日報·鏡海》於 6 月 30 日正式創刊。

2 座談會上的發言稿後來亦結集為《澳門文學論集》，於 1988 年由澳門文化學會和澳門日報出版社聯合出版。

3 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第 84 頁。

門文學的概念內涵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座標參考。

2. 文學副刊

澳門背靠內地，外聯四方，不僅是蓮花寶地，也是文化熱土。有限而狹小的四方輻輳之地，卻能冶中西於一爐，蘊含著無限而巨大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功能¹。有關澳門的研究之所以日益成為國際顯學，與澳門的當代影響增大、國際地位提升有關，也因其極端複雜卻又和諧相融的獨特社會形態和文化生態在中國乃至世界文明進程中所揭示的積極意義和借鑒意義相關。

文學作為特定歷史語境中人們自由抒寫個體情志的行為，成為窺探歷史的一扇窗戶。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就是歷史。生長在中國邊陲的澳門文學，為澳門研究提供了生動豐富、立體直觀的人文圖景。

澳門文學是在報紙副刊的懷抱中慢慢長大的。澳門蓬勃興旺的報業及編輯對副刊的高度重視，給澳門文學的成長提供了寬闊的園地和肥沃的土壤。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緩慢發展，澳門文學在報紙副刊這片“新園地”已開出了鮮麗的花朵，結出了累累的碩果。可以說，欲窺澳門文學之狀貌，是繞不開副刊的。然而，與園地的豐收景象相異的是，副刊文化卻“常常被論家忽略”，幾乎成了徒懸的匏瓜。因此，對於“典型地體現著澳門文學的基本生態”，“演

1 陳樹榮〈再議建設澳門學〉一文認為該功能“最主要的方面體現在‘大啟文明’”。郝雨凡、吳志良、林廣志主編《澳門學引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49頁。